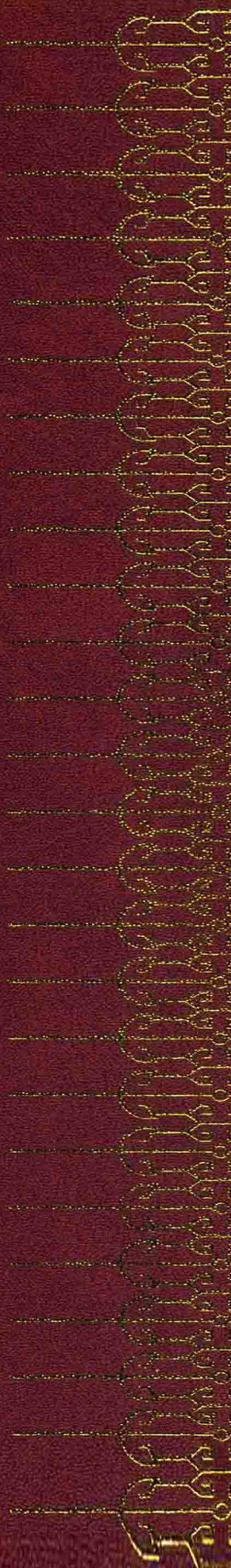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中華大典

語言文字典

湖北教育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中國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爲「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任：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彥 李東生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員：張小影 伍 傑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頤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湯漢清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逸 吳文俊 柯俊

傅熹年

編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樸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逸

楊寄林 穆祥桐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可 江曉原

鄭國光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傑

姜學中

編審：趙含坤

崔望雲

秘書：宋陽

裝幀設計：章耀達

《中華大典》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為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為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內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為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內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並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別為《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羣策羣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大典》為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強，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彙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攷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為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錄分類方法，並根據各類學科內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為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為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錄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內容：

①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論說：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

③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內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錄：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韻文。

⑧雜錄：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攷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錄。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內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彙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內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為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內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為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為準，並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為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脫、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領導小組

組長：尹漢寧

副組長：姚中凱 文成國 李以章 張猛 張良成 邱久欽

孫永平 王建輝 劉志田 周藝平

組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何大春 邱菊生 馬莉 徐金山 黃永林 湯旭巖

劉國新 劉道清 駱郁廷 謝雙林 聶昌慧

《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工作委員會

主任：劉道清

副主任：趙亞平

邱菊生

胡偉

成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勇 李作君 徐德歡 張先立

張躍 蔡夏初 韓敏 聶昌慧

《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編纂委員會

顧問：李格非 唐作藩 趙振鐸

郭錫良 裘錫圭 王寧

主編：朱祖延

執行主編：宗福邦

副主編：舒懷 李思維 駱瑞鶴

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朱祖延 李思維 宗福邦 郭康松

陶國良 曹海東 萬獻初 舒懷

劉鶴雲 駱瑞鶴 蕭惠蘭 羅積勇

《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編輯部

主 任：劉道清

副 主 任：蔡夏初 李作君

成 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 皓 王粵漢 李作君

胡 東 蔡夏初 龍行雲

《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序

漢語、漢字既是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漢文化最爲重要的載體。以漢語、漢字爲研究對象的漢語言文字學，在數千年發展演變的歷史長河中，爲我們留下了極其豐碩的成果，這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由於學科理論、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以至學科對象的變化，漢語言文字學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各具特點，互有異同。爲了與現代語言文字學相區隔，學界將清末以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稱爲傳統語言文字學。《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是按現代學科分類對傳統語言文字學資料博采約取之後所作的分類匯編。

傳統語言文字學在古代被稱爲小學。小學原是與大學相對的概念，意指初等學校，其學習科目爲禮、樂、射、馭、書、數六藝。隨著語言文字的發展和文獻的積累，六藝中的『書』即識字，就越來越顯得重要，以致從漢代起就以識字正字之書爲小學之書。東漢初，班固刪取西漢劉歆《七略》而述爲《漢書·藝文志》，其小學類皆爲童蒙識字課本，故王充《論衡·別通篇》說『《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其後語言文字著作日益豐富，小學所指範圍也日漸擴大。《隋書·經籍志一》小學類所著錄的，除識字課本外，還有字書字典、書體書法、音韻、俗語、鮮卑語、石經等著作。五代劉昫據唐毋煥《古今書錄》撰成《舊唐書·經籍志》，其小學類，第一次將《爾雅》、《廣雅》、《方言》、《釋名》等歸入其中，即加入了訓詁方面的著作。到了宋代，歐陽修撰《崇文總目敘釋》，則以《爾雅》等列爲訓詁之學，《三蒼》、《說文》等列爲偏旁之學，注音反切等列爲音韻之學，篆隸古文列爲字書之學，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學科體系初步確定下來。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合并宋人偏旁之學、字書之學爲字書之屬，再加上音韻之屬、訓詁之屬，傳統學科體系自此成爲定制。一九〇六年，章太炎著《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分析了小學在國學系列中的地位、作用及走向，根據當時已流行的國文、中文、語文、語言文字諸說，提出以語言文字學替代小學，以規範學科名稱的主張，獲得學界公認。這標誌著傳統小學向近現代漢語言文字學轉型的開始。從此，漢語言文字學學人便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在傳統語言文字學深厚基礎上，吸收東漸的西學理論，結合漢語、漢字實際，將語言文字學科逐步推向現代化。

傳統語言文字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特質。

漢語言文字，既是人際交往的媒介，又是文獻記錄的工具。但語言文字本身變動不居，以致言有雅俗、方通之別，字有古今、南北之殊，通曉不易。於是，周宣王太史籀制《史籀篇》，為識字正字之始。春秋戰國時，在《左傳》、《論語》、《孟子》和諸子著作中已出現對字形字義的解釋，為析形辨義之始。《墨子》、《公孫龍子》、《荀子》辯論名實，為理論研究之始。始創于先秦，終定于漢初的《爾雅》，為辭書編纂和系統訓釋詞語之始。故先秦為傳統語言文字學萌芽時期。

戰國時，各國文字互有歧異。秦滅六國，天下為一，文字亦歸於一統。漢承秦制，人文勃發，儒學復興，傳統語言文字學遂得以滋生漫衍，派別枝分。漢及漢以後的傳統語言文字學，承傳周秦，而不斷發展，積累厚重。

漢許慎依據周秦《史籀》、《蒼頡》諸篇，廣收古文籀篆各體，博采通人衆說，撰為《說文解字》，明六書，考形體，定音義，探字源，正訛誤，於是有《說文》之學。魏晉以後，學者依《說文》部居類字之法，網羅衆字，辨正形音，歸納義項，復引文獻用例如以證明，《字林》、《玉篇》一類通釋羣書文字的字書不斷出現，此類字書根據需要，或增加字數，或變更部居，或改變用途，於是有字書字典之學。宋人喜好古代鐘鼎彝器、封泥璽印、瓦當陶磚、簡牘、石刻、貨幣諸文字，詳加搜討，廣為刊佈，並考其字形，別其音義，於是有金石文字之學。清末出土甲骨卜辭，於是又有甲骨文之學，金石文字得以擴充其範圍。在上述各專題的研究中，諸如漢字起源、漢字功用、漢字結構方式、漢字形音義關係、漢字字義生成發展、漢字形體演變等理論問題的 research 也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態勢。

音韻學源於先秦聲訓以及漢代學者之解經說字。先秦文獻中每多聲訓，表明當時學者已知某些字之間含有音義的聯係。漢代學者繼承和發展了先秦人對文字音義關係的認識，說字多言讀曰、讀若、讀如、讀與某同等，漢代並產生了長言、短言、內言、外言、急氣、緩氣、舌頭、舌腹、橫口、蹶口一類描寫分析音讀的術語；至漢末，更發明反切，於是有辨音注音之學。三國魏李登作《聲類》，晉呂靜作《韻集》，於是有以韻書歸韻正音之學。六朝學者擬讀古音為叶音，宋吳棫等人進一步發展叶音說。明陳第、清顧炎武等在批評叶音說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語音發展時空觀，對古音詳加考核，於是有古音之學。六朝周顒、沈約諸人闡明四聲，使學者對漢語聲韻調的認識日臻完善，運用更加自覺，於是有聲律之學。隋陸法言作《切韻》，唐人以為便，修訂遵行，傳於後世，於是有《切韻》之學。唐人應制作詩有其定式，宋代又依唐韻而頒行禮部韻，以規範科舉詩賦，於是有詩韻之學。唐宋學者歸納聲紐為字母，據反切以考聲音關係，而韻分四等，語音分析細緻入微，於是有等韻之學。元周德清依時音撰為《中原音韻》，以便當時審音與劇本創作，於是有曲韻及近代時音之學。

訓詁學濫觴於春秋戰國學者對語義的辨析和對概念的界說，而奠基於《爾雅》。此後多有《爾雅》的續作、仿作與解讀，於是有雅書之學。《詩》、《書》、《禮》、《樂》定自仲尼，其章句的發明則始于子夏。隨後，對文獻的傳、說、解等相繼出現。延及漢魏，多隨文訓詁，至於六朝，義疏大行，牖導唐宋正義，於是有羣書注釋之學。漢揚雄撰《方言》，服虔著《通俗文》，此後或注或考，或新纂續編，於是有方言俗語之學。春秋以來，庠者養也，政者正也，助者藉也等聲訓，常見於典籍，故訓聲音相爲表裏，漢劉熙因之制《釋名》，三國韋昭繼而辨析之，於是有語源之學。孔子云修其辭，立其誠，漢唐注疏和歷代詩話，多言互辭互明、對文散文、錯綜比喻，於是有修辭之學。自周代重視離經辨志，句讀漸興；《公羊》、《穀梁》釋隕石、鷗飛，語序初明；毛氏傳《詩經》，服虔注《左傳》，辭、詞並用，虛詞有釋；宋人分虛實、動靜，詞類粗分；逮及清末，西學東漸，馬建忠仿拉丁語法而成《馬氏文通》，系統的文言語法學由此誕生。

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在兩千多年的經典解說與研究中形成，發展，完善。三者彼此相對獨立，又相互爲用，相關著述極大豐富了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學科內涵。

傳統語言文字學知識是打開古代典籍奧秘的鑰匙。通過古代典籍研究中華學術文化，必須從古代語言文字入手。因此，歷代有建樹的學者無不精通語言文字學，無不視語言文字學爲傳統學術的根基和入門管鑰。

傳統語言文字學是傳統學術的基礎學科和工具學科，對其他學科來說也具有引領的作用。比如正是因爲齊梁間學者揭示了漢語的聲調，文學理論研究中的聲律論，文學創作中近體詩的格律，才賴以進一步形成規範。又比如清末以來考古學家利用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成果考釋古文字和出土文獻，從而發現了新史料，填補了古史研究的空白，帶動了新史學的繁榮。還比如北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宋李誠撰《營造法式》，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無不借重語言文字學以正名辨物，考鏡原流，給古代農學、建築學、醫藥學增添了異彩。至於學者個人，憑藉扎實的語言文字學基礎進入其他領域，並成名家巨擘者，更不勝枚舉，尤以語言文字學發達的漢代、宋代、清代爲甚。

傳統語言文字學儘管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學科體系構建研究不足，厚古薄今，考證煩瑣等等，但這不影響它在我國文化史、學術史中的重要地位。總體而論，傳統語言文字學自有其理論基礎，獨特的研究方法，可貴的學術傳統，豐厚的研究成果，故能在學林中獨樹一幟，長盛不衰。傳統語言文字學言必有據、無徵不信、孤證不立的學術規範，以及不蹈襲、重創新、不拘門戶的治學精神，在今天看來更顯得珍貴。

就漢語言文字學的整個發展歷史而言，傳統語言文字學又是現代漢語言文字學的基礎與淵源。其一，傳統語言文字學